

诗性体悟, 诗意考究

——林庚楚辞研究的方法

李霖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林庚关于楚辞的研究著作《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融诗体探源、生平考证、作品审定于一体,《〈天问〉论笺》融笺释、今译、论文于一体,虽写作时间不同,研究内容有异,却体现出林庚稳定一致的研究方法与特色。林庚这两部著作,不论是校释、考证还是审美批评,始终贯穿“诗性体悟”的研究方法,立足文本,会通诗心,蕴含“创作主体”的研究立场、“文学本位”的研究视角、“诗理逻辑”的研究思维,折射出林庚诗人之身份、诗人之性情。

关键词:林庚;楚辞研究;诗歌;屈原;《离骚》;诗意;校释;考证

[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2)06-0122-07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2.06.013

Poetic Comprehension, Poetic Research:

Lin Geng's Research Methodology on the Poetic Style of Chu

Li L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Lin Geng's research work on the poetic style of Chu, *The Poet Qu Yuan and His Works*, integrates the source of poetic style, the lifetime textual research, and the work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and *The Comments and Annotations to "Asking Heaven"* integrates annotation, current translation and papers. Although both their time and content is different, they reflect Lin Geng's stable and consistent research methods and characteristics. Lin Geng's two works mentioned here, on its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textual research or aesthetic criticism, always run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 of "poetic comprehension". Based on the text and understanding the poetic heart, the two works contain the research position of "creative subject",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standard" and the research thinking of "poetic logic", reflecting the researcher's identity and temperament as a poet.

Key words: Lin Geng; research on the poetic style of Chu; poetry; Qu Yuan; *Lisao*; poetic flavour;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textual research

林庚是 20 世纪楚辞学界个性鲜明、特色突出的楚辞学家。林庚所著的《诗人屈原及其作

品研究》《〈天问〉论笺》,研究时间均长达数十年,但篇幅都较简洁,语言也极精粹。林庚在简

收稿日期:2022-05-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1FZWB072)

作者简介:李霖(1994—),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洁、精粹的论述中,辨析楚辞之“体”、校释楚辞之“文”、考证楚辞之“史”、破译楚辞之“义”、阐释楚辞之“美”,完成了对楚辞的多方面审视,且新义频现、创见迭出。可以说,这两本楚辞学著作,奠定了林庚在20世纪楚辞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但学界对其楚辞研究成果关注较少,目前将林庚的楚辞研究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仅两篇期刊论文,分别是徐志嘯的《林庚先生的楚辞研究》^[1]和陈长江的《林庚楚辞研究中的“兮”字说》^[2]。前者对林庚的楚辞学成果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与总结,在对林庚的楚辞研究上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为更全面研究林庚的楚辞学打下了基础。后者切入点较小,是对林庚关于楚辞“兮”字研究的梳理与总结。总体来看,林庚楚辞的研究,还有可拓展的空间。鉴于此,我们挖掘林庚楚辞研究的方法,以期总结蕴含其间的思维习惯与研究特色。

一、据诗理校释

欲究楚辞深层之“义”,须先知楚辞表层之“意”,字句校释是楚辞研究的基础工作。林庚的楚辞校释,除了对《天问》进行全篇字句诠释外,还对楚辞关键篇章的关键字句进行校释。在校勘训释的过程中,林庚的方法特点较为明显。他注重楚辞文本内证,以校勘方法中的理校法研究楚辞,彰显出作为诗人特有的感悟力。

关于理校,陈垣曾言,“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3]理校法“高妙”而又“危险”,用之者自宜慎之又慎。林庚运用理校法,具体是据文理而校,即据楚辞各篇或同一篇之逻辑脉络、前后内容以及语言形式特征而校,以避其“危险”,显其“高妙”。

林庚常根据楚辞的行文结构、内容的连贯性、人物形象的统一性来校勘窜文,如他关于《离骚》中窜文的校勘。为论述方便,现将林庚指出的《离骚》中窜入的文字引述如下:^①

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
户服艾以盈要(按:腰)兮谓幽兰其不可佩
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理美之能当
苏粪壤以充帟兮谓申椒其不芳
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
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
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
皇剌剌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
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甯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林庚将这十四句分成三段,指出从“民好恶其不同兮”至“谓申椒其不芳”为第一段;“欲从灵氛之吉占兮”至“挚咎繇而能调”为第二段;“苟中情其好修兮”至“齐桓闻以该辅”为第三段。林庚认为,《离骚》在驰骤变化中自有严密的结构,可分为陈辞、求女、吉占三大段。“‘陈辞’一段所用便全为‘史实’,‘求女’一段所用便全为‘美人’,‘吉占’一段所用便全为‘芳草’。”^{[4](P103)}通过考究《离骚》的结构、楚辞的韵脚、屈原的形象特征等,林庚指出这十四句乃是窜入的文字。

林庚认为,从《离骚》的结构来看,这十四句虽是写“吉占”,却并非以芳草象征生命的高洁,而是单独以“玉”取譬,因而未与《离骚》行文保持文字上的完整性。从韵脚来看,这十四句中“迎”与“故”、“同”与“调”,都存在问题,其用韵之乱与讲求用韵的《离骚》不相符。从屈原形象特征来看,屈原是“少年得志”的贵族,只因怀王“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才“远逝以自疏”。故而,屈原不满的情绪不同于“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宋玉,不同于一般只盼望交好运道的说客文人,因此,第三段所言“吕望鼓刀”等一

连串的传说不符合屈原的形象。林庚进一步指出,在屈原其余作品里,如《九章·抽思》《九章·哀郢》《九章·涉江》《九章·怀沙》等,亦无“平步登天”等盼望交好运道的思想表现,因而第三段乃窜入的文字。

对这从来无人加以猜疑的十四句诗,林庚根据行文脉络、音韵特征、人物形象等进行论证并指出这些乃窜入的文字,显示出他作为诗人所具有的独到眼光。

林庚常根据屈原不同诗篇以及同一诗篇前后诗意的一致性来训释字词,如他对《离骚》中“民”字的解释。

《离骚》中“民”字共出现如下六次:

- ①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 ②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 ③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 ④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 ⑤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 ⑥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

王逸将《离骚》中的“民”字统一释为“万民”,即一般的劳动民众;汪瑗《楚辞集解》中句①②③信从唐《文选集注》本,将“民”校为“人”字,并认为,“人心,屈原自谓也”^{[5](P48-49)},从而否定“万民”说,提出了“屈原自谓”说。王夫之则注解为:“民,人也,谓同列之小人,如靳尚之党”^[6],认为“民”乃指“小人”。上述观点均只见于注家对相应诗句的解释中,而无全面且深入的论证。林庚不囿于已有阐释,于1948年撰写《屈原的人格美与〈离骚〉“民”字解》一文,对《离骚》中的“民”字进行了具体、详细解析,得出《离骚》中的“民”字皆应为“人”之泛指结论,否定了之前已有观点。

不同于以往注家多根据屈原所处时代背景与个人命运来分析“民”字,林庚则深入楚辞文本进行探究。通过列举对照《离骚》《涉江》《抽

思》《哀郢》之含“民”字诗句的诗意,林庚认为,“民”不应作“人民”解。他指出,如《离骚》之“哀民生之多艰”与“民生各有所乐兮”,若释“民”为“人民大众”,则“人民大众”之“多艰”与“各有所乐”是自相矛盾的。又如“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一句,若释“民”为“人民大众”,则“屈原似乎与党人(当时的贵族政治集团)站在一边,反而与‘人民’对立起来……这里的‘民’字显然都不是指‘人民’或‘民众’”^{[4](P66)}。通过引述《大雅·生民》篇中“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之“民”释为“人”,《大雅·烝民》篇中“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之“烝”释为“众”,“烝民”作“众人”解,林庚遂亦以“人”释楚辞之“民”,发现处处文通义顺,故认为,“民”乃“人”之泛指。游国恩认为,“民生,即人生,本书多以民代人”^[7],与林庚之说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左右,楚辞学界出现了拔高屈原的现象,多在字词训释、情志批评上宣传屈原的爱国思想,如对楚辞“民”字释为“人民大众”,认为屈原是爱国爱民的模范。林庚未受此影响,坚持深入文本进行解读。通过打通楚辞不同篇目,考察不同诗句诗意的一致性,并比对外证资料,林庚对《离骚》中“民”字的阐释,比较符合诗理逻辑。

因时代久远,《楚辞》在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窜文错简、字句讹误的问题。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从屈原作品内部寻找证据,注重《楚辞》文本的相互参证,根据文理对《楚辞》的字句篇章进行审定诠释,也是一条必要的、基本的途径。林庚以诗人之心,深入《楚辞》文本内部,据诗理校释《楚辞》,可谓是其研究楚辞的一大特点。

二、由诗义考证

楚辞考证的依据,或在楚辞文本与历代楚辞研究论著之内;或在楚辞文本以外而与楚辞相关的史料里;或在楚辞文本内外的综合考察

之中。林庚的楚辞考证,思路与依据主要在“楚辞文本之内”,主要在“诗义”(诗歌思想内容)之中。他考证楚辞的地名、人名、作品篇目及作品中所涉事迹等,皆重文本内证,常通过考究诗歌内容的连贯性与统一性来考证对象所指。

关于楚辞地名、人名的考辨,林庚主要从诗义的一致性与矛盾性角度切入。

王逸注《涉江》“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一句中“方林”为地名,林庚结合上下诗句内容以及诗句结构的对应性否定了王逸的观点。他指出,上句之“皋”意指“边”,“山皋”即“山边”,上句即“依山而行”,故而,林庚认为下句应为“傍林而歇”,“方林”并非地名,而据《广雅·释詁》将“方”释为“大”,将“方林”释为大树林。林庚依此法考证词句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在《〈招魂〉地理辨》一文中,林庚对“修门”“庐江”“长薄”等的解释,均从诗歌创作的视角得出不同观点。

对于楚辞人名“彭咸”,在林庚之前已形成三种观点:一是王逸《楚辞章句》将“彭咸”注解为:“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8]即认为彭咸乃“殷时贤大夫”;二是汪瑗《楚辞集解》注为:“彭咸者,乃屈原之远祖,而彭咸且当殷之末世,悼其丧乱,遂遁流沙。遭壅君,处乱世,与屈原实相类焉。”^{[5](P331)}即认为彭咸乃彭祖;三是王闳运《楚辞释》注为:“彭,老彭。咸,巫咸。”^[9]即认为彭咸乃指老彭和巫咸两人。林庚否定王逸、王闳运之解,赞同汪瑗之说。

林庚先是联系屈原“被放”“自沉”等时间节点,分析《离骚》《抽思》《怀沙》等与屈原放逐有关的篇目中有无涉及、是否应涉及“自沉”“彭咸”等内容,从而指出“彭咸”与“自沉”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并结合东方朔的《沉江》、庄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等外证材料,考究其中对“彭咸”“屈原”“沉江”等的描述,指出王逸之前并未有人认为彭咸乃沉江而死。在此基础上,林庚结合楚辞文本内证,抽绎

其他受屈原爱慕的人物的共同特点,以探究彭咸其人。通过将彭咸与楚辞中所描绘的鲧、伯夷、伊尹、姜太公等相对比,林庚认为“彭咸”,一方面是治世之才,另一方面是隐者神话式的人物,具有耿直、不迁的特征,并推测彭咸可能为屈原之先人,指出“铿”“咸”二字在上古音中极易相混,“彭咸”或即“彭铿”^{[4](P76)}。

林庚对“彭咸”其人的考证,借助类比联想的方法,充分挖掘文本材料,将彭咸与楚辞中其他人物形象进行对比,角度较为新颖,丰富了“彭咸乃彭祖”说的论证。

关于楚辞篇目的考订,林庚主要结合文本内容与结构特征来进行,最典型的例子是其关于《湘君》《湘夫人》是否为同一篇诗歌的考证。

一般认为,《湘君》《湘夫人》是两篇不同的诗歌,林庚否定此说,指出《湘君》《湘夫人》本为一篇,在诗篇内容和题目上都不可割裂,并列三方面的理由。其一,《湘夫人》中有关于“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的神气描写,而《湘君》中没有,这与作为湘水正神的湘君身份不符;其二,《湘君》《湘夫人》描写的是同一个恋爱故事,内容一致,回环复沓;其三,《湘君》《湘夫人》叙述连续,不可割裂^{[4](P141-145)}。此外,林庚指出,《湘君湘夫人》作为完整的一篇,不但是一个神的祀礼,而且显示出地道的民间故事本色^{[4](P144)}。他结合文本诗句,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湘君、湘夫人的恋爱心理和诗篇所蕴含的“民间的希望与感情”。同时,从内容出发,从戏剧的角度,有层次地将诗篇分成歌剧的两幕:一幕为《迎神曲》,另一幕为《送神曲》,指出“《湘君湘夫人》也是一个戏剧的雏形”^{[4](P145)}。

除林庚外,陈子展也认为《湘君》《湘夫人》为一篇。但陈子展是从《湘君》与《湘夫人》的本事,即舜与二妃的故事来切入的。他认为,“舜曾创作过箫,二妃吹箫思舜,写入作品倒也切合故事……研究这两篇,当合二为一,勉强分割不得,其道理亦在此。”^[10]林庚对《湘君》《湘夫人》

本为一篇之三个方面原因的探讨,皆和文本内容有关,是从诗篇叙述结构与内容连贯性的角度来进行的论证。且林庚将诗歌分作歌剧的两幕来分析《九歌》的戏剧特征,意味着他未流于诗篇考订的浮泛、肤浅层面,而是深入文本肌理进行审美感悟与严密辨析。

关于楚辞篇目中所涉事迹的考证,林庚也主要着眼于诗篇内容。如他考证《天问》中所涉传说史实,即主要从文本内容出发。他根据《天问》中的六句诗而考证秦民族的历史传说,根据《天问》中的后十句诗而追溯楚国的兴衰史。他关于《招魂》中所招对象的具体考证,仍是如此。

学界对《招魂》所招对象的考证,结论各异。如“宋玉招屈原之魂”说、“屈原招自己的生魂”说、“屈原招楚怀王的亡魂”说等。而林庚则认为,以往各家对招魂对象的考察,“都从一个共同点上出发,就是把《招魂》作为是一个个人哀悼的作品”^{[4](P92)}。他通过细究文本内容,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1948年5月,林庚撰写《〈招魂〉地理辨》一文,从情调表现、有无个人理想、有无戏剧性的排场等方面,详细比较《大招》与《招魂》的描写内容,指出《招魂》是屈原为一典礼而写。此说在其撰写于1953年4月的《〈招魂〉解》一文中得以发展。他根据《招魂》文本内容,即文中所体现的招魂时间、招魂规模以及有怀王参与的特征指出,《招魂》这一作品“从多方面说明它本身乃是一个典礼的举行”^{[4](P93)},并结合《招魂》篇所展示的宫室陈设之富丽、舞乐描绘之铺张,进一步指出“招魂”所招对象为“贵族武士”^{[4](P94)}。林庚这一观点,意味着对“宋玉招屈原说”“屈原自招说”“招怀王之魂说”的否定;意味着将《招魂》由“个人哀悼的作品”,转变定位为“一个典礼的展示”;意味着对以往关于《招魂》性质看法的否定。这都是林庚以其诗人特有的感悟力详析文本内容的结果。

林庚的楚辞考证,沿着诗学感悟的定位,深

解文本,细辨诗篇,分析问题和阐述观点皆以文本对象为中心,在研究思维方法上显示出较强的诗学感悟力,为诸多研究课题提供了新的解析视角。

三、依诗情批评

随着西学东渐,晚清民国的楚辞批评开始摆脱传统经学的批评局限,转而融通中西批评思维,综合时代环境、文本内容与艺术思维,对楚辞进行文学和审美视角的诠释。林庚的楚辞批评,也继承了这种方式。他常从诗人的立场来审视,虽有结合时代背景,但主要是深入文本肌理以体悟诗情(诗本身所蕴含的情境内容与情感蕴涵),从而阐释楚辞作者之志、作品之美、语言运用艺术之妙,实现与屈原诗心的会通。林庚的楚辞批评,主要包括人格批评与审美批评两个部分。

关于屈原的“人格”,20世纪以前的楚辞批评中未明确提出“人格”这一概念,但已涉及对屈原品性的阐发。梁启超在其《屈原研究》中率先提出并详细阐述屈原“人格”,其后楚辞学者在梁启超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多种论述,林庚即为其中之一。他在《屈原的人格美与〈离骚〉“民”字解》一文中,结合屈原文本中所体现的思想情感,总结出屈原的人格美具体体现为:清醒的情操、坚定不移的求索精神、强烈的民族意识^{[4](P68-69)},并明确指出屈原对这一品格,“用了无数华贵的诗句,无数纯洁的比喻,这些都流为后人辞藻的装饰;然而在屈原却不是装饰;他只是—种自然的呼唤……因此感动了无数的人们”^{[4](P69)}。在林庚看来,应从屈原作品出发认识屈原人格,屈原伟大崇高的人格,无疑是表现在他的作品上,从那些作品里认识了这位诗人之后,这诗人便成为一首无言的诗,由此感觉到其人格的存在^{[4](P61)}。

林庚将屈原诗篇视为屈原对人格的呼唤与追求,将屈原人格与诗篇统一起来,这便在精神

层面对屈原其人、其作予以了高度肯定与认同。在对屈原人格的具体批评中,林庚注重从横向和纵向两维视角出发,且始终以文本为中心,将屈原作品与屈原人格相结合。

从横向视角上,林庚结合屈原作品内证,对比屈原思想与孔孟思想的异同,指出屈原与孔子性格相反而与孟子性格相投,并从时代因素上考察屈原人格思想的形成。

林庚指出,《离骚》中虽然屡次提到禹、汤、尧、舜,但未提及孔子最崇拜的周公;孔子赞美《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屈原之作却哀且伤。因此,屈原与孔子在思想上并不相投。他又指出,孟子之“浩然之气”,即屈原所谓的“中正”;孟子之“塞于天地之间”,即屈原所说“与天地兮比寿”,因而屈原与孟子在思想上相投。他进一步指出,“孔子是生于先秦思想刚开始的时期……多少还有一点保守的色彩……至于孟子的时代则完全是进取的;这所谓进取,也就是对于真理的彻底的追求。”^{[4](P63)}故林庚认为屈原思想即是受到时代的感染,“无保留的、把全副的诚意放在真理的认识上”^{[4](P63)}。通过结合屈原作品内容,探究屈原思想与孔孟思想之间的关系,林庚在屈原人格溯源上较为细致,在屈原与儒家思想之关系的探究上较为充分。

从纵向视角上,林庚将屈原思想放在历史影响的层面来考察。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自秦汉以来,曾受荀子、庄子、《楚辞》这三种力量的支配:荀子支配了汉代,庄子支配了魏晋,《楚辞》则自“建安”以至“盛唐”莫不受它的支配。唐代能于先秦之后,独成一个灿烂的文化时期,那正是《楚辞》的力量,在说明着屈原人格带来的启示^{[4](P63)}。

林庚突出屈原人格的价值,突出《楚辞》的力量,将屈原人格与屈原诗歌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对屈原借作品以表现人格的肯定,是对诗歌本身表现人格功能的重视与推崇。

综上所述,林庚深入文本探讨屈原人格、将

作品与作者相结合的批评方式,没有伦理道德等外在批评标准的局限,而是视屈原作品本身为“纯粹的文艺的创作”^{[11](P55)}。他重视屈原作品之“有意的追求”^{[11](P56)},重视通过体会屈原作品中的情感流露,从而考究屈原人格的表现,这表明林庚已注意到屈原诗歌对于“自我”的展示。而林庚视屈原为诗的作者,视屈原本身为诗,强调诗歌本身的“表现性”,也体现出林庚作为诗人评论诗歌的本色所在。

对于楚辞的审美批评,林庚也是深入文本体悟诗歌情境。而林庚对诗歌情境的感悟,主要是基于诗歌语言的暗示性。他曾指出,语言的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12](P194)};且林庚认为,诗歌语言暗示性的获得,在于牺牲一部分逻辑,“(逻辑)本来是我们自己为了方便而规定的……人类的可贵即在于能规定也能解放”^[13]。为获得这份“解放”,林庚跳脱出了语义训诂的范畴,而上升至诗性体悟的层面,即主要体悟语言背后潜在的“情境美”。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为其对《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一句中“木叶”的分析。

“木叶”的“运用场合”为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木叶”的形象是在萧索凄清的秋景中得以创造出来。林庚结合语言的暗示性,借由联想和想象,通过将“树”与“木”、“木叶”与“落木”进行比较,从而体悟“木叶”这一形象所独有的艺术特征,及其与“惆怅凄清”之情感氛围的契合所在。

林庚指出,“树”本身枝叶繁密,可使人产生浓密的联想,“木”则更多使人联想起树干,仿佛本身即含“落叶”的因素^{[12](P194-195)}。他认为,“树”与“木”所暗示的颜色性不同。“树”的颜色与叶较相近,一般为褐绿色,“木”则不同,其蕴含着落叶的微黄感、干燥感^{[12](P195)}。对于“木叶”与“落木”的区别,林庚指出,“落木”不含“叶”的绵密之意,更显空阔。“木叶”既富有

“叶”的绵密之意,又蕴含“木”的疏朗之感,于萧瑟秋风下,更添柔情,有助于塑造《九歌》中湘夫人之迢远情深的美丽形象,正与“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之“于萧索凄美中企盼又惆怅”的情境氛围相契合。

语言的审美、文本情境的体悟以及潜在力量的发掘,是对楚辞中所凝聚的美学精神与艺术灵性的珍视,而这有赖于诗人的诗性敏感与诗性修养。林庚发挥其特有的优势,深入文本,以诗心感悟楚辞的语言形象,使楚辞语言形象中所蕴含的情境氛围、丰富活泼的表现力、潜在的审美效果得以挖掘出来。故林庚运用诗性体悟之法进行楚辞批评,有其合理性与价值。

四、结语

林庚的楚辞研究之所以创见迭出,主要在于其是诗人,善于想象且深谙诗理,并将此特性融入楚辞研究,以“诗性体悟”之法研究楚辞。当同时代的许多学者重视运用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法来研究楚辞,注重从外围来研究楚辞时,林庚则始终以其特有的诗性感悟力,立足于屈原作品内部,深入至文本肌理层面来研究。林庚凭借其诗歌创作的经验,以诗人之眼光,注重打通屈原各篇作品、综合审视作品的创作过程、梳理作品结构脉络与主要内容,进而对楚辞进行校释、考证及批评。经由诗性感悟,林庚对楚辞文本内证进行了充分的、独到的挖掘,为诸多研究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林庚的楚辞研究向我们证明:“诗性体悟”在楚辞研究的不同层面皆具有重要价值,

学术研究可于理性之中注入诗性的艺术。此即林庚楚辞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

[注释]

- 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林庚认为楚辞中的“兮”字是“表音不表情”的“句逗”字,因此,他对屈原诗作的标点断句和通常的迥异,一律将两句断句标点为一句。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参考文献]

- [1] 徐志啸.林庚先生的楚辞研究[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47-51.
- [2] 陈长江.林庚楚辞研究中的“兮”字说[J].北方文学,2018(20):223-225.
- [3] 陈垣.校勘学释例[M].北京:中华书局,2004:133.
- [4] 林庚.林庚诗文集(第6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 [5] [明]汪瑗.楚辞集解[M].董洪利,点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 [6] [清]王夫之.楚辞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5:7.
- [7] 游国恩.游国恩楚辞论著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8:130.
- [8]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13.
- [9] [清]王闿运.楚辞释[M].吴广平,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3:10.
- [10] 陈子展.撰述.楚辞直解[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473.
- [11] 林庚.林庚诗文集(第3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 [12] 林庚.林庚诗文集(第7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 [13] 林庚.林庚诗文集(第2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97-98.